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库

SHIJIIE GEMING YU WENXUE ZHUANXING

# 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

张永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库

SHIJIE GEMING YU WENXUE ZHUANXING

# 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

张永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张永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2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库)

ISBN 7-5004-4981-X

I. 诗… II. 张…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853 号

责任编辑 陈 仪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传 真	010-8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a href="http://www.csspw.cn">http://www.csspw.cn</a>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陈平原

在《〈来之文录〉序》中，夏晓虹称其师季镇淮的治学以先秦两汉、中唐及近代为重心，每个时期又各有侧重点，分别为司马迁、韩愈与龚自珍。“季先生选取每段文学史中具有开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家，作精湛的个案分析，便可以顺流直下，理清纷繁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一研究路数，以点带面，诚为研究文学史的有效方法。”真的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季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人手处往往也都是此等大转折时代的“关键人物”。比如孙文光的专攻龚自珍、张中的选择柳亚子、张永芳的钟情黄遵宪，以及夏晓虹的执著梁启超，便都是这一学术思路的合理延伸。

稍有研究经验者，大都晓得抓“关键人物”的合理性。问题在于，这种强调沉潜把玩的读书方法，吃力不讨好，现在已经很不时兴了。就算你有足够的聪明与勤奋，打好根基后，很快左顾右盼，上挂下联，落实“以点带面”的设想，可还是赶不上人家跑马圈地、蜻蜓点水的便捷。再说，既然是大家，研究者必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还有，书读得越多，越明白学海无涯，不敢轻言著述。既然世人普遍服膺张爱玲的“出名要早”，此举之不入高人眼，自在意料之中。只是看多了各种靠颠倒时论而出奇制胜、迅速崛起又迅速陨

落的“成功人士”，我反而怀念起季先生及其弟子们的认真与执著——从细微处做起，尽其所能，一步步往前挪，能走多远算多远。

记得永芳兄说过，各人天资不一，不能强求平等，就这个水平，只要尽了力，也就心安理得。这态度，我很喜欢，因其平淡中隐含着自信，很像季先生，也很像季先生的老师朱自清。念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都会记得朱先生撰于1922年的长诗《毁灭》，其中常被论者引述的是这么几句：“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二十年前初读这诗，也曾热泪盈眶——为了诗人那难得的平常心以及“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情怀。

其实，当年在西南联大，季镇淮先生跟随的是闻一多，王瑶先生的导师才是朱自清。只是那时候中文系的研究生很少，闻朱的学生一起上课，没什么门户之见。有趣的是，日后的发展，王似闻，而季则更像朱。学者的精彩表现，与师承有关，但更根源于机遇与才情。只要本人感觉得心应手，那就行了，无所谓错位不错位。对于闻一多惊鸿一瞥的怒发冲冠、壮怀激烈，世人多能欣赏；需要提醒的是，无论从政还是论学，像朱自清那样“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同样值得表彰。

我认识好几位季先生的弟子，发现其大都有乃师之风——沉稳，朴实，不过分张扬，也很少显山露水，但同行都知道其内力深厚。看永芳兄锲而不舍地关注“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尤其是详细考察黄遵宪的大同理想、诗史风格、海外见闻、乡野民歌等，说实话，我还是很感动的。因为，这年头，愿意踏踏实实读书做学问的，不是很多。

2004年7月12日于圆明园北

# 目 录

## 第一辑

诗界革命与黄遵宪·····	(3)
引言·····	(3)
一 诗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3)
(一) 诗界革命的兴起——“新诗”·····	(4)
(二) 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	(11)
(三) 诗界革命的高潮·····	(14)
(四) 诗界革命的历史局限与历史意义·····	(18)
二 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地位·····	(23)
(一) 诗界革命的先导——黄遵宪的“新派诗”·····	(24)
(二) 黄遵宪的影响与诗界革命的发展·····	(33)
(三) 黄遵宪的创作成就与诗界革命的理想目标·····	(36)
(四) 黄遵宪的“新体诗”与诗界革命的高潮·····	(42)
结语·····	(49)
附录：“诗界革命”诗作选·····	(50)

## 第二辑

试论“新诗”·····	(67)
-------------	------

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	(83)
试论诗界革命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	(100)
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晚清诗坛的新变 .....	(114)
梁启超与诗界革命 .....	(139)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革命 .....	(155)
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首倡者	
——夏曾佑和谭嗣同 .....	(166)
蒋智由与诗界革命 .....	(180)
丘逢甲与诗界革命 .....	(187)
略说黄遵宪与金和 .....	(195)
简论康有为的后期诗作 .....	(199)
粤讴与诗界革命 .....	(203)
关于楚辞散文化特点的断想 .....	(208)
黄遵宪与民歌 .....	(213)
《近代诗文述略》摘录 .....	(218)

### 第三辑

略论黄遵宪的“大同”理想 .....	(225)
“晚清诗史”探源 .....	(235)
海外见闻与时代新知 .....	(243)
试论黄遵宪对地球的认识 .....	(254)
黄遵宪和“新世界诗” .....	(260)
试论黄遵宪诗歌创作的成就 .....	(271)
黄遵宪诗艺散论二题 .....	(285)
黄遵宪的对联艺术 .....	(295)

## 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

- 论黄遵宪与梁启超的交往…………… (305)
- 后 记…………… (320)
- 序言跋语…………… (326)



# 第一辑



# 诗界革命与黄遵宪

## 引 言

19世纪末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兴起了改良主义的文学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前夕，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首先发起了诗界革命；戊戌变法以后，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也相继而起。

一般认为，诗界革命的主要参加者除夏、谭、梁外，还有康有为、黄遵宪、丘逢甲、蒋智由等人。其中，尤以黄遵宪诗歌创作的成就最高，当时便被人们誉为“近来诗界三杰之冠”。<sup>[1]</sup>

但是，也有人认为，黄遵宪与康有为并没有直接参加诗界革命，只是“由于政治思想的一致，文艺上努力的方向也就相同”<sup>[2]</sup>而已。这实在是研究诗界革命时必须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的写作，就想集中辨析一下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 一 诗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黄遵宪究竟有没有直接参加诗界革命？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诗界革命的来龙去脉。鉴于以往人们对诗界革命的评

述一直比较简略，这里不能不稍微多作一点叙说。

概括起来，诗界革命是以梁启超为中心人物的一次文学改革运动，开始于戊戌前夕梁启超等人的试作“新诗”，发展于梁启超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在《新小说》创刊后进入高潮阶段。它虽然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毕竟自觉地反映了过渡时代的历史要求，在我国诗史上留下了不容抹杀的一页。

### （一）诗界革命的兴起——“新诗”

提起诗界革命，人们经常征引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一段记载：

复生（谭嗣同）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夏曾佑），而复生亦慕嗜之。

这段话概括记述了诗界革命开始阶段“新诗”的创作情况。

“丙申、丁酉”，即 1896 至 1897 年间，正当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之前。当时，中国新败于日本，被迫割地赔款，国势更加衰落；日本和西方列强，却正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争夺世界的斗争日趋尖锐激烈，中国也就成了众所窥伺的砧上鱼肉，瓜分惨祸迫在眉睫。

形势的危机，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资本输出猛增的直接刺激<sup>[3]</sup>，再加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朝政府不得不向民间资本作出让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有了真正的发迹，<sup>[4]</sup>民族资产

阶级的人数和影响迅速扩大，他们当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要求，从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至此迅即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1895年，康有为带头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随后又同梁启超等创立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立意“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sup>[5]</sup>，海内风气为之一变。

政治上变法维新的需要，有力地推翻了思想解放的波澜。由于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早已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充分暴露出它的腐朽性，此时爱国志士无不十分急切地转向国外，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中寻求新的精神武器，留学生人数成倍增加，各种学会、学堂、报馆也如雨后天春笋般地兴办起来。这样，在思想界便发生了所谓“旧学”与“新学”的对立。夹杂着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肤浅了解和十分幼稚的主观理想的“新学”<sup>[6]</sup>，一时十分流行；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即包括旧体诗词在内的“旧学”，则受到爱国志士深深的厌恨。“新诗”正是作为“新学”的直接产物和“旧学”的直接反映而问世的，“新诗”的首倡者夏曾佑和随和者谭嗣同、梁启超，全都是“旧学”的大胆叛逆，“新学”的狂热信徒。

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回忆说：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据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

在《谭嗣同传》中，梁启超也指出：

（谭）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

亦好谈中国兵法，三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豁然贯通。

正因三人有着共同的志趣，所以当他们于1895年秋冬之际相聚于北京时，来往十分密切，“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sup>[7]</sup>，深深沉浸在思想解放的兴奋之中，于是“新诗”便应运而生了。《亡友夏穗卿先生》记载说：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我只记得他第一首（见附录）……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见附录）……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

可见“新诗”的产生，首先反映了作者对于思想解放的追求。他们为了将新的思想内容引入诗歌创作，毫无顾忌地大量采用翻译词语和自造隐语，即使把诗写得涩僻难懂，根本不像诗了，也在所不惜。这一方面造成了“新诗”满纸堆积新名词的弊病，另一方面确令“新诗”作者尝到了思想解放的欢快。梁启超日后评述夏曾佑的一首“新诗”时，即满怀深情地回忆道：“读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sup>[8]</sup>

严格说来，这样的“新诗”，其实是韵文化的“新学”，它与思想界的关系，远比与诗坛的关系更为密切。故此，“新诗”又

名“新学之诗”。蒋智由后来评夏曾佑的诗时说它：“亚欧捭阖谋空壮，耶佛评论语更鲜。”<sup>[9]</sup>梁启超也说它：“驱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sup>[10]</sup>着眼点都放在“新诗”所表现的“新学”上，可谓抓住了实质。

“新诗”的产生，也反映了作者在传统诗坛另辟新境的努力。当时的正统诗坛，被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诗风统治着，不论宗诗派末流“同光体”的“生涩奥衍”，还是假古董汉魏六朝派的“杂凑模仿”，都只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走的是复古的老路。“新诗”由于自觉采用了大量“新名词”，虽然仍旧是五七言诗体，已经有了不同于旧诗的新面目，走的是努力接受外来思想文化影响的新路，“新名词”本身也给诗坛输入了新语汇、新诗料，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渴望吸收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这对于抱残守缺的正统诗坛来说，无疑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和洗刷，也就是在事实上拉开了晚清诗界革命的序幕。朱自清先生曾高度评价“新诗”探求新路的意义：“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sup>[11]</sup>

“新诗”的弊病，恰如梁启超后来指出的那样，“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这也是“新诗”富于时代意义的特点。“新诗”用新名词“以自表异”，正是要力求不同于旧诗；“新诗”作者的偏嗜，也正是要立意与旧诗决绝。这不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首先是思想内容问题。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直言不讳地承认：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新诗”与“新名词”，就这样结下不解之缘。“新诗”对“新名词”的生吞活剥，既出于对“新学”的狂热崇拜，急切地要用“新诗”去宣扬“新学”，同时也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与“新学”本身的不成熟有关。梁启超早已清醒地认识到，“新诗”的稚拙生硬，正可照见当时思想界的浅薄粗疏，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

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

就诗而论，这样的作品（见附录）当然不能算成功。梁启超自己也承认，他所作的“新诗”，大多“皆无从臆解之语”，“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sup>[12]</sup>

这样的诗，自然很难广泛流传。梁启超回忆“新诗”创作情况时，总是说“吾党数子”或“吾党二三子”如何如何，足见“新诗”作者的圈子一直很小很小。他在当时作的一首“新诗”写道：“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sup>[13]</sup>这等于是直截了当地承认，“新诗”的基本作者只有夏、谭二人再加他自己。

但就是他们三人，也未能在了一起相聚很久。1895年年底，谭嗣同即返回湖北，协助其父做了一段救灾工作；<sup>[14]</sup>待他于1896年春天重回北京时，梁启超已应聘去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不久，谭嗣同又去南京任候补知府；年底，夏曾佑也到了天津。<sup>[15]</sup>从此以后，三人再也没有相聚于一处。这对“新诗”的创作，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新诗”先天既已不足，后天又缺调养，终于未能健康地成长起来。

“新诗”的弊病是那样明显，不待后人启齿，梁启超等早有



自知之明，《饮冰室诗话》便明确断言：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因而，仅只简单地指摘“新诗”作者自己早已认识到的弊病，实在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既不能解释“新诗”在当时应运而生的历史必然性，也无法解释“新诗”作者明知其弊而慕嗜不舍的狂热态度；如果进而仅仅根据“新诗”存在的弊病，去估价整个诗界革命的成败，那更加违背历史的真实。拿人家自己都否定了的东西，硬当作人家事业的主要部分，未免太不近人情，在逻辑上恐怕也难以成立吧？“新诗”确实标志着诗界革命的开始，但终究只是诗界革命的幼稚阶段，绝不能代表整个诗界革命运动。

但是，硬把梁启超等试作“新诗”的努力等同于整个诗界革命，实在已是由来已久的误解，这里不能不稍加分辨。

最先发生这一误解的大概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中说：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有很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在韵文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

后来人们未加深辨，将这一误解相继沿袭下来，至今几乎已